

社会主义阶段要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国民经济

——李先念经济思想研究之一得

邹惠卿

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和障碍,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建立起战胜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还要重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善于充分地 and 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的,来为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大生产服务。这些是李先念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李先念在中央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他在不断向实践学习和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经济观点和见解。本文仅就其中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该及时地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国民经济;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进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等重要观点,作一点尝试性的探讨,妄开李先念经济思想研究之先河,以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沃土”。

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和障碍,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建立起战胜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李先念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

何为及时?李先念就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客观情况决定了开头两三年的工作不得着重抓政治改革,即利用一切政治的手段,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彻底地解放社会生产力,为进行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扫清障碍。就中国特别是湖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说,从1949年全国一解放,党领导人民抓紧进行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以及建立新的政权等一系列工作。到1952年中旬,经过了两三年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基本完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已经被打垮,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强烈要求发展生产,这就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李先念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坚决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

方针，我们会落后于客观形势，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热情。”^①于是，李先念及时地明确地提出：“现在，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重心要转变，要由政治改革转到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上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②

李先念强调指出，大家必须明确，及时地把工作重点从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是正确的决策。早在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讨论了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转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后，革命在全国加快了进程。李先念指出：“因此，我们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在思想上明确起来，今后的工作是集中主要的精力抓好增产节约，抓好经济建设。”^③李先念在这里并不是要求广大干部仅只是从组织上服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大家从根本上弄通弄懂为什么要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李先念认为，把工作重点从政治改革及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无产阶级革命目的需要，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是革命发展的必然。毫无疑问，这种转移是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迫切而又长远的需要。李先念说：“过去三年，党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上是对的。”^④这对于刚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来说，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是完全必要的。而现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新的上层建筑一旦建立起来以后，政治手段对它来说只是起保护的作用，使之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这时更为迫切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基础，来巩固刚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变成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因此，李先念指出：“现在各项改革完成了，遭受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抗美援朝的战争也已基本结束，应当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断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使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⑤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来看，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是必须的，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李先念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又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富强国家。”^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但是，革命并不是为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革命夺取政权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富强国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同时又说明，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有两点是必须具备的，即人民的支持和物质基础的建立。而这两点又是相互关联的、相互照应的。人民对政权的支持最终是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生活的改善和不断提高为条件的。因此，李先念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生产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人民同样会反对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不能巩固的。”^⑦李先念认为，建国以前，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在政治上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建国以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可以说：“过去我们在政治上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今后就是要在经济上打下基础，真正从经济根基上来巩固人民的政权。”^⑧关于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李先念指出：“现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干部思想问题。”他说：“我们的许多干部仍然钻到政治改革中出不来，对搞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很差，对经济工作缺乏起码的热情和兴趣。”^⑨而且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正确思想。例如，一部分干部认为，党的工作重点由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的政治斗争就不会那么重要，政治工作可以放松。李先念指出，这是非常错误的。把工作重点由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不是说政治已经不重要，丝毫不表明今后可以放松政治斗争或政治工作。他

对这种错误思想严肃批评说：“今后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但也不能放松政治改革。”为了使大家对这一错误思想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他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政治改革所以不能放松，是因为阶级敌人虽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残余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而且斗争的方式更加巧妙、更加隐蔽。”^⑩只要阶级存在，只要有国家政权存在，就会有政治和政治斗争，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还会存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还存在政治工作。因此，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政治和政治斗争会一直是重要的，无时无刻是可以放松的。但是，这又并不是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敌人存在，就应该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方面，放在政治方面，而不可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可以集中主要精力建设人民政权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李先念认为，如果是那样，也是错误的。他指出：“当然，对反动势力还要继续保持革命的警觉性，但如果硬要等到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了才转向经济建设，那就是舍本求末。”并明确表示：过去，“我们在政治改革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三年，今天必须朝经济建设的椅子方面转。”^⑪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政治改革了，政权就巩固”了。对于这种只重视政治，而忽视经济建设的片面认识，李先念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他指出：重视政治斗争对政权的建立和保护作用，“这有道理，但不完全。”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没有政治斗争，政权不可能建立，建立起来了也不可能巩固。但是不完全，因为仅有政治手段作保护，而没有物质作基础，政权也不可能真正巩固。社会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李先念指出：“应当看到，经济建设搞好了，政权才能真正巩固。”他认为：“做好经济工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⑫显然，李先念的这一论断，是从经济对社会的安定，对巩固政权的作用角度讲的，毫无经济可以代替政治之意。李先念在论述了政治、经济对政权的作用关系以后指出，今后的工作可以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生产建设，一条战线是政治改革。他说：“有的要以增产为主，有的要以节约为主，有的是增产节约并重；有的可以完全转入生产建设，有的要在生产建设过程中进行政治改革补课，也还有的地方仍要以政治改革为主。”^⑬但是，今后无论哪一种政治改革形式，都必须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

除上述不正确的思想影响着工作重点转移外，在一部分干部中还有其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行为阻碍着工作重点的转移。例如，有的人认为，工作重点由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只是暂时的，经济建设工作比起政治斗争来要容易得多，因此，产生了盲目乐观、麻痹松懈情绪。李先念一发现这种思想苗头，就及时地指出：这种思想“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和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腐蚀我们的党，甚至断送我们的事业。”因为这些人不懂得党的工作重点由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标志着革命阶段的转移，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标志着革命战略的转移，即由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因此，这种转移不是一时之需要，而是长期的根本性的转移。从经济建设的复杂程度来看，特别是从我们国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贫穷落后的经济现状来看，经济建设的任务比政治斗争的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动员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的过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经济建设都将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李先念说，在这样艰巨复杂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而“我们的干部一般只是经过战争与土地改革的锻炼，在今后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小生产者，大力发展生产，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党在城乡各方

面的领导，是没有经验的。”^⑭说到这里，李先念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批评说，可是有的同志却看不到自己的工作能力与当前的经济建设工作任务不相适应，不努力学习，反而在那里盲目乐观，搞一些华而不实的事情。甚至还有的人不是考虑如何发展经济，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努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况，而是考虑个人的成败，计较个人的得失。李先念分析了产生上述思想和行为的根源。他说：“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农民自私观点的具体表现。”^⑮根据部分干部中存在的上述思想行为，李先念特别强调指出：“现在，我们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把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否则，我们就要被动，就要落后。”^⑯

但是，在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除了存在各种思想问题外，也还存在某些实际问题。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干部中，更为普遍的是缺乏经济工作知识，缺乏经济管理经验，文化水平也不高；同时，在过去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中所形成的工作习惯、工作方法现在也不适用了。针对这种情况，李先念提醒大家注意：“干部队伍的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工作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很难把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⑰可是，由于干部的文化知识素质太低，有些同志在转变中会有困难，甚至痛苦，发生苦闷。于是，李先念指出：“因此，干部思想必须来一个转变，充分重视经济工作，真正钻到经济建设中去，学会搞好经济工作的本领。”^⑱他亲切开导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些同志发生苦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苦闷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以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精神，去学习新知识，认识和掌握新事物，问题才能解决，苦闷才会克服掉。”^⑲他鼓励大家：“我们应该有学会做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只要把头‘削尖’，真正钻进去，是一定能学会经济这门复杂的科学的。”成为在经济工作方面有特长的干部。并且还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不懂得经济还可以原谅，如果两三年之后还不懂经济，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⑳就有被淘汰的可能。李先念的这些经济思想，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在我国，工作重点一直未能很好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不能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不用说工作重点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谁要搞了一下生产，马上就会被指责为“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是不问政治，不看社会主义方向的人；如果谁要是抓经济工作，马上就会戴上“唯生产力论”，“用生产压革命”，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大帽子。李先念说：“总之，谁要抓经济工作，他们就给谁打棍子，戴帽子。”^㉑这样一来，就搞得人们提心吊胆，谁也不敢抓经济工作，谁也无法抓经济工作。结果，不仅经济没有新的发展，以前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点经济底子，也几乎涤荡一空，整个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再次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李先念一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也及时地指出，经济部门的同志要解除顾虑，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强调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㉒并再次重申：“要真正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对经济工作，要狠狠地抓住不放，切实抓出成效来。”他在1980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说：“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很多，任务很重，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进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各级党委在领导工作中，必须坚决遵循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㉓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李先念经济思想的一贯性，同时也表明了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态度。

二、重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目前，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流通是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日益明显。它不仅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也决定着国家积累、财政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才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到发展，人民政权得到巩固。正因为如此，李先念特别强调指出：要“重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②4}解放前，我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极不发达。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我国的商品经济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同过去年代相比，我国社会商品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花色品种都有较大的增长，商品的交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原有的基础薄弱，再加之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工作中“左”的思想指导所造成的失误，对商品生产的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所以，目前我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不够发达，商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还必须花大力气进一步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李先念说：无论是商业、财政，还是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面向生产，支援生产，参与生产，促进生产，使我们的工作，一切都从发展生产出发，一切都为发展生产服务。”^{②5}只有商品生产大发展了，财政才能大发展，其他事业才能大发展，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大发展。

然而，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却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即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不懂得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不善于充分地 and 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他们不了解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李先念指出：这些同志之所以“不善于充分地 and 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大生产服务，是由于他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②6}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小生产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李先念说：“我国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半自给或大半自给的小生产的状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变成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的大生产，但集体农民基本上还是在从事手工生产劳动。”^{②7}这种长期的小生产的环境条件，局限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挡住了人们的视野，禁锢了人们的习惯和方法，使之不易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具大优越性。要消除旧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首先必须消除产生这些观念和习惯势力的环境条件，即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李先念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就是要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逐步改造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用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来代替绝大部分手工业式和半手工业式的劳动。”^{②8}这种生产力的大跨度的提高，生产领域的实践飞跃，必然地冲击着小生产的观念和习惯势力，必然地要在思想认识领域产生变革，产生斗争。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具有小生产观念和习惯的人，用小生产的方式、方法来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阻碍思想认识领域的变革。李先念指出：“我们有不少同志还是用小生产的眼光、习惯、方法来看待和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其主要的表现形势，就在于“他们在农业

生产中仍然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工业生产中也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总想万事不求人。”^②无论是农业中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还是工业生产中的“大而全”、“小而全”，都是一种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形式。无非是一切都与外界隔绝而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孤岛里面自搞一套。其结果非但不能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方式，沟通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和互通有无，而且亦不能根据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方针来发展生产，增强竞争力。这就必然地形成生产力配置的极不合理，必然地浪费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和资金，必然地形成企业计划与国家计划的脱节。显然就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国力的增强。再说，任何一个企业、部门、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要做到一切东西都自给自足则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把生产的发展仅仅限制在自给自足的限度以内。我们只有采取扩大的商品生产，才能提供充足的商品量，满足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国家实力的。

李先念指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看不到生产的发展必然要求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发展，要求交换范围的扩大。”当今时代，生产已极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这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又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一方面使新的生产领域、新兴产业、新的产品种类从旧有的生产领域、产业、产品中分离出来或者完全新产生出来；另一方面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消费的范围、质量和数量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要求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的经济。我国过去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分工不广泛。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由于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限制，社会分工的水平比较低。致使农村许多地区还处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工业中“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分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真正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同时又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商品市场的交换，货币制度等形式使各方面相互紧密地联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发展国际贸易，需要进口一些必需的商品，同时也要大力出口某些国内剩余的商品。如果在生产中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方式，不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结果，必然阻碍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用小生产的眼光、习惯、方法组织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人，李先念说：“他们看不到只有依靠分工和协作的发展，交换范围的扩大，才能促进各类产品质量的完善，品种规格的增多，成本的下降，生产计划性的加强，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③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既要一方面大力消除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弊病，又要一方面大力发展适合社会需要的商品生产。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大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准备条件。发展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的性质不会产生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社会主义是能够按照自身的原则和要求自觉地对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李先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而盲目调节的，它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缓和或克服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但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危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比例失调，完全可以也必须自觉地进行调整。调整好了，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前进。”^④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种不想发展社会专业分工和协作，不想发展

商品生产，打算在一个企业、部门、地区内做到样样都自给自足的思想和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须自觉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仅不可能迅速发展，反而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增强计划性，自觉地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李先念指出：我们的财政、银行、商业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都要自觉地“来大力协助各级计划机关共同引导全国的大小企业，努力按照国家规定的品种、质量、数量、成本、交货时间来组织自己的生产。”^②绝不能象资本主义那样无计划地盲目地发展生产，否则，势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生产也就不能顺利地进行。其次，按照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组织生产。一般说来，生产决定消费，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反过来制约生产、决定生产。当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水平时，更是如此。因此，商品生产者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按照消费者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否则，商品、货币就不可能完成其价值转换，商品的价值也就难以实现，毫无疑问，商品也就只能积压浪费。因此，李先念指出：“对那些产品不合国家需要、不合用户需要、不合人民需要的生产单位，我们一定要及时向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提出改进的要求，必要的时候还要提出警告。”^③最后，必须按照经济效益原则组织生产。商品生产必须追求产值、产量，没有一定的产值、产量，商品生产是不能发展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盲目地追求产值、产量，或者说单纯地追求产值、产量。要在追求产值、产量的同时，注意扩大产品的花色品种，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节约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做好服务，讲求经济效益。任何一种商品生产，如果只简单地追求产值和产量，而不追求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效益不高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亦如此。对于只是盲目追求产值的生产单位，李先念说：“一定要帮助他们切实纠正那种盲目地追求产值，认为不管产品是否符合需要，只要生产出来国家都会收购的错误观点，从而改进工作，以免损害国家计划，浪费国家的原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资金，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时期总任务的完成。”^④

李先念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必须重视发展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紧密联系着的，他们是构成社会总产品循环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从社会货币总循环来看，也是如此。要发展商品生产不可能没有商品流通，也不可能不发展商品流通。李先念在论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辩证关系时指出：“我们知道，工农业生产是财贸工作的基础。”“只有生产大发展了，财贸才能大发展。但是这决不是说，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财贸工作，包括商品的流通，资金的积聚和分配，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以及对劳动人民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各项服务工作，只起一个被动的从属的作用。生产决定交换和分配，交换和分配反过来又对生产起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加显著。”^⑤李先念还把商品流通比作是人体的循环系统，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血液循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财贸工作，不能离开商品的交换和资金的分配。他说：“交换和分配组织得好，生产就能够按照国家的计划多快好省地进行；相反，交换和分配组织得不好，生产就不能顺利地进行，不能有计划地进行，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李先念还把重视商品流通提高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他认为，如果没有商品流通，或者商品流通组织得不好，“我们也就没有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指出：“一定要使财贸战线和整个经济战线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

(下转第125页)

想，称道灵异，可以大大激活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出广阔的想象空间，而且佛道二家超出现实人生之外探讨人生问题，使作家们能够从一个超现实的角度，飞腾想象，塑造出一些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灵灵异独特的艺术形象，对社会人生作鸟瞰俯视。不象儒家那样潜心于人生事务之中，而是沉缅于世外之想，放谈空虚，参破世相，对人生之价值作出深入的哲理思考。因此，在一定角度上说，佛道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远比儒家深刻。从这个观点认识和理解戏曲作家和作品，就具有了新的高度。由此作者又进一步联系到戏曲创作总是以梦幻比喻人生，指出这种观念除具有消极的一面外，而“其主要的贡献在于，将剧作家观察生活的视点由传统的人伦政治方位，扭转或提升到哲理层次，从而深化了剧作家对人生的认识”，亦即“促使戏剧艺术家从一个全新的方位和角度——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哲理层次来俯视人生。”这一论断深刻而中肯，符合戏曲史的真实。汤显祖的《四梦》多是从这一人生视角来观察人生、反映生活的。他在《邯郸梦记题词》中说：“夫身都将相，饱厌浓醲之奉，迫束形势之务，倏然而语以神仙之道，清微闲旷，又未尝不欣然而叹。”这样，作家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去发掘生活的深层意义，产生深刻而独到的发现。众多的明清戏曲评论家，一再主张《西厢记》应以《草桥惊梦》折作结，也是出于剧本以此作结，表现张生对人生的执着到觉醒的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如果终以团圆，则至少淡化了剧本的这一深刻意义。

作者在梦与戏的比较中，看到了两者在传情、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等方面的共同点，阐释了“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美学论断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使人们对汤显祖的这一论断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准确。这使人想到，我们对于戏曲美学的诸多论断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是不准确不深刻的。如能象此书一样，从一些更广泛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探讨，洞幽烛微，将会妙入精髓，多所发现。

《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一书，以其新颖的立论，严密的论证，翔实的材料，独创规履，力破陈言，成为当代戏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与郑传寅先生的踏实刻苦的学风分不开。郑先生以弘扬祖国文化传统为己任，筚路蓝缕，矢志不移，数年来广泛钻研了我国的民俗遗产和佛道的经藏，又通读了十三经，以及众多的戏曲著作，因而为戏曲研究的开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祝愿戏曲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如此佳作问世。

(上接第66页)

道理。”^⑧

但是，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受小生产习惯的束缚，只重生产，而轻流通。李先念认为，这“同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早已不相适应。”他指出：“随着我们向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前进，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就愈来愈突出。因此，我们一定要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能健康地发展。

注释：

①③⑥⑦⑧⑪ 见《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②⑭⑮⑰⑲⑳㉑ 同上书，第140、132、134、142、312、456、345页。

④⑤ 同上书，第150页。

⑨⑫⑬⑳ 同上书，第142页。

⑩⑬ 同上书，第144页。

⑯⑱ 同上书，第151页。

㉒㉓㉔ 同上书，第319页。

㉕㉖㉗ 同上书，第320页。

㉘㉙㉚㉛ 同上书，第21页。

㉜㉝ 同上书，第322页。

㉞ 同上书，第415页。